

美伊核博弈的建构主义分析

赵伟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杨明星 (上海外国语大学)

[内容提要] 伊朗核危机是伊拉克战争后世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核问题上的激烈对抗和争斗,国内外学者见仁见智,作出了种种不同解释。本文借用建构主义的有关概念和原理来解读美伊在这场核危机中的博弈思维和心态,认为伊朗核危机产生的关键在于美伊对彼此的“敌人”角色认知和身份建构,进而揭示美伊 20 多年来长期敌视和对抗的原因,并据此分析伊朗核危机的根源、实质及未来走向。

[关键词] 美国 伊朗 核博弈 建构主义 身份认同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核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伊朗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决意发展核技术,加快实施核计划,态度颇为强硬。而美国则步步紧逼,全力打压,在加强舆论攻势的同时,不断发出军事打击的威胁。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后,美伊两国在核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较量,如何遏止伊朗的核计划成为布什第二任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¹

2005 年 2 月 23 日,正在欧洲访问的布什与德国总理施罗德联合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但立即遭到伊朗总统哈塔米的严辞拒绝。为什么美伊如此对立?仅仅是因为核问题吗?

围绕美伊核对抗的原因和实质,目前学术界主要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文明冲突论”,强调美伊核冲突源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两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对立;另一种是“权力和利益冲突论”,认为美伊核争端源于两国在战略意图即争夺中东霸权上的根本冲突。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还不够全面,忽视了美伊冲突的社会心理因素。为此,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来考察和解读美伊核争端。本文并不否认美伊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利益方面的冲突,而是进入美伊关系的社会结构层面,尝试用建构主义核心概念之一——“身份”(认同)来解释美伊核冲突的根源和实质。伊朗核危机表面上看似乎是伊朗是

否遵守联合国核开发有关国际规则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国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突出表现在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在政策上的相互敌视。美伊核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对对方身份的认知和界定,即双方都把对方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这一“对方是敌人”的认知使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碰撞和对抗。

一、美伊“对方是敌人”的身份建构

建构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三驾马车之一,它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和解析国际关系。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亚历山大·温特在 1999 年出版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中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核心概念:“文化”、“身份”和“利益”,他强调观念、文化和身份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温特指出,文化是共同知识和共有知识,其具体形态表现为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和法律等等,文化是“自我证实的预言”。在哲学层面上,身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有行为体的属性,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包含行为体是谁或者是

¹ Steven R. Weisman, “Bush Confronts New Challenge on Issue of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9, 2004.

什么的内容,表示社会类别或存在状态。¹ 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指的是行为体的需求,国家利益是国家意愿、国家偏好、国家想要的东西。建构主义还把文化、身份、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为:文化塑造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身份,文化的变化意味着国家身份的变动,不同体系的文化确立了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的身份确立了不同的国家利益。总之,建构主义坚持以身份界定国家利益,即身份的作用是建构国家利益,同时利益决定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理论。^④

说到底,建构主义把“我是谁?他是谁?”这类基本哲学本体论问题重新列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温特不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物质力量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国家身份使得物质力量有意义。对此,温特举例说,500 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 5 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④ 美国对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英国一点也不担心,而对可能拥有一两件核武器的朝鲜却极为忧虑,正是基于对英国和朝鲜身份的不同认定。在美国人眼中,英国是朋友,是可信赖的天然盟友,而朝鲜则是敌人,是“流氓国家”和“邪恶国家”。伊朗的核技术远不能与以色列的核武器相提并论,但是美国并没把以色列的核武器当作威胁,而对伊朗核计划的反应却十分强烈,其原因同样也在于美国对这两个国家身份的不同认定。

众所周知,美国和伊朗曾是铁杆盟友,但自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两国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么,两国是如何走向敌对的呢?这里确有文化上的认同差异。

伊斯兰革命之前,美伊两国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并未妨碍两国成为盟友。巴列维在全国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淡化伊斯兰影响,否定伊斯兰文化的主导地位,强化西方价值观,奉行亲美反共政策,照搬美国模式开展现代化运动,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淡化了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另外,从历史上看,巴列维政府对美国素有好感,因为在二战期间,伊朗依靠引进美国势力将长期侵占和统治伊朗的两大殖民帝国英国和俄国赶出了伊朗。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一直

把伊朗当作抵制苏联南下波斯湾、印度洋的桥头堡,两国建立起战略同盟关系。伊斯兰革命爆发后,随着“人质事件”的发生,美伊由过去的亲密合作走向严重对抗,双方都把对方界定为自己的头号敌人。1980 年 4 月,美国正式宣布同伊朗断交。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认为,巴列维腐败独裁,紧紧追随美国,脱离伊朗国情推行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运动,引进西方价值观,贬低伊斯兰价值观,导致伊朗社会贫富悬殊、动荡不安,而大力扶植巴列维政府的美国及其西方价值观则是罪恶之源。霍梅尼决定发动伊斯兰复兴运动,用伊斯兰价值观来拯救伊朗和伊斯兰世界,将矛头直指向伊朗输出西方价值观、干涉伊朗内政的美国,决心把美国势力赶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推行反美反西方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公开宣称美国是大撒旦(大魔鬼),是个邪恶、堕落的国家,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反对美国。

而美国则认为,霍梅尼建立政教合一的极权国家,执行反美政策,排挤美国势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提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观念格格不入,严重侵害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政府曾罗列伊朗宗教政权所犯下的支持恐怖主义等“五大原罪”。^{1/4} 前总统尼克松甚至还把伊朗认定为美国在中东的头号威胁,认为具有强烈地区企图和历史自豪感的中等强国伊朗,其威胁远远超过伊拉克。^{1/2} 从此,美国把伊朗确认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敌人,伊朗由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变为美国实现中东战略利益的最大障碍。两国互为敌人的身份由此正式确立。

美伊这种互为敌人的身份在“9·11”后被进一步强化和升格。“9·11”后,美国大幅调整全球战略,把反恐和保证本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出台了“先发制

¹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198-229、281-290 页。

^④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109-110 页。

^④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 323 页。

^{1/4} Robert Kagan & William Kristol,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Encounter Books, LA, 2000, pp. 131-139.

^{1/2} Richard Nixon, *Beyond Peace*, Random House, 1994, pp. 144-146.

人”的国家安全新战略。美国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国家,称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和暗中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不负责任的国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布什在今年 2 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再次严厉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寻求发展核武器和遏制民主进程。而伊朗则认为,美国给伊朗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严重损害了伊朗国家的尊严”;¹ 美国对伊朗采取遏制加制裁的敌视政策对伊朗国家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美国一直在计划利用军事或非军事手段推翻伊朗政府。美伊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均把对方视为肉中刺、眼中钉,互相妖魔化。美国把伊朗的国家身份由“9·11”前的“无赖国家”升格为“邪恶轴心”国家和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而伊朗则把美国视为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双方均证实、强化和提升了对方的敌人身份。这种国家身份建构加剧了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不认同和不信任。

美伊互相建构为敌人身份,除了源于两国在宗教、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文化上的不认同外,还在于这两个国家行为体之间长期的恶性互动。在美伊两国的社会互动中,当一方把另一方确定为敌人后,就会相应采取敌视的言行和政策。而“对方是敌人”的心理、观念和判断一旦从对方的行为中得到证实后,反过来又会被不断强化,使得双方的对抗和敌视加剧。美伊双方常用自己的观念和逻辑来推断对方的动机和预测对方未来的行为,断定若自己不采取强硬措施,对方就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这种恶性互动导致两国敌对关系和敌人身份的不断强化和升级。因此,美国提出伊朗应彻底、永久放弃一切核活动的要求只会强化而不会削弱伊朗加快实施核计划的决心和意志。

二、敌人身份 在美伊核博弈中的影响

按照建构主义理论,一国对他国身份的认定将会引发对自身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和判断,进而影响该国外交行为方式。伊朗的核项目最初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开始的。在巴列维时期,美伊

建立了亲密的盟友关系,美国对伊朗的核项目从技术到原料供应等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并未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伊互为仇敌,美国一改以往支持伊朗核项目的做法,转而坚决反对伊朗发展核计划,把防范和遏制伊朗核计划作为美国对伊政策的重要内容。“9·11”后,随着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改变,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核计划的攻击和防范力度。显然,美国对伊朗核计划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认为伊朗的国家身份已由美国的盟友变成了敌人。

建构主义认为,在霍布斯文化环境中,国家之间的身份是互为敌人,互不信任,互不尊重。在敌对状态下,国家利益是防范、威胁、征服甚至消灭对方,生存和安全高于一切,国家会动用一切力量扩军备战,取得军事优势,消除安全威胁。在外交决策和实践中总是作最坏的考虑,时刻提防他国消灭自己。温特还具体总结出敌人身份对国家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产生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总是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因为面对敌人的威胁,不是杀死敌人就是被敌人所杀;二是决策往往作最坏的准备;三是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的关键,要生存,就要积极备战;四是战争一旦爆发,必须置敌方于死地,即使战争还没有爆发,也必须准备先发制人。^④ 以此对照美伊核危机,可以发现敌人身份对美伊界定各自国家利益、选择外交行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美国方面看,由于伊朗的身份是“敌人”,所以美国对于伊朗核计划的意图肯定会往“最坏处想”。美国始终认为伊朗是打着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幌子暗中发展核武器。美国认为伊朗是能源大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需要依靠核电站来提供能源。因此,美国认定,伊朗的核计划绝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发展核武器。不过,美国虽然相信伊朗几乎完成了核燃料循环的前期工作且再过两三

¹ Jahangir Amuzegar, “Iran’s Crumbling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3, p. 46.

^④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 28、330-331 页;郭树勇:《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第 142-145 页。

年就能造出核弹,¹但至今并没有掌握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确凿证据。《纽约时报》2005 年 3 月 9 日报道说,美国目前所掌握的伊朗核情报很不充分,政府仅仅依据这些情报无法对伊朗是否在发展核武器一事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伊拉克情报是前车之鉴。^④

对于美国来说,“敌人”伊朗是海湾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是这一地区极少几个敢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之一。伊朗已拥有射程达 1300 公里、可以覆盖以色列全境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流星—3”导弹,倘若其掌握了核武器,必将对美国的中东驻军和盟友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认为,推翻萨达姆政权客观上为伊朗消除了一个劲敌,更容易使伊朗在中东坐大,对美国的中东利益形成挑战。此外,美国还认为伊朗与恐怖组织有牵连,担心其将核武器扩散给恐怖分子,从而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当然,布什政府也希望通过伊朗核问题,进一步实践其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改造,用核机制来规制伊朗,以满足美国的反恐需要,提升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外交信誉,维护美国的核霸主地位。

美国打压伊朗核计划,最根本的目的恐怕就是借机消灭“敌人”伊朗,也即改变、推翻伊朗现政权,把这个中东石油大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认为,伊朗是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建立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绊脚石,国务卿赖斯更将伊朗称为“暴政据点”。布什在年初的就职演说中,将在大中东地区推行“民主、自由”列为其第二任期的战略性任务,发誓要“改造”或“推翻”这一地区的“专制”和“暴政”政权,还毫不掩饰地鼓励伊朗民众发动“民主运动”,并承诺美国政府将给予支持:“对伊朗人民,我今晚要说,在你们追求自由的时候,美国与你们站在一起。”^(四)

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打压也与伊拉克战后局势有关,美担心伊拉克战果落入“敌人”伊朗之手。美国推翻萨达姆本来是想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的世俗化政府,但此次伊拉克大选的结果却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获得了议会超过半数的席位,什叶派控制伊拉克新政府已成定局。美国认为,伊朗对伊拉

克什叶派的影响是他国所难以比拟的,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和过渡政府总理贾法里与伊朗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美国担心伊朗向伊拉克输出伊斯兰革命,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伊朗政权,因而欲借核问题向伊朗施加压力,削弱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

伊朗同样基于美国“是敌人”的身份认定,不顾美国压力,坚持发展核计划。首先,伊朗不能屈从于“敌人”美国的无理要求,放弃和平开发核能的合法权利。伊朗一方面再三声明无意研发核武器,另一方面反复宣称和平开发利用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力,放弃核计划等于放弃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伊朗总统哈塔米 2005 年 2 月 23 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说:“无论是我的政府还是今后的伊朗政府,都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技术的不容置疑的权利。”^{1/4} 5 月 15 日,伊朗议会通过“和平利用核技术法案”,该法案敦促政府重启铀浓缩活动,授权政府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框架内和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和平利用核能。^{1/2} 伊朗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从去年 11 月开始暂时中止了铀浓缩活动,但反复强调这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义务,伊朗有权随时恢复铀浓缩活动。伊朗开发核能的理由是,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国内能源需求旺盛,伊朗所生产的原油近一小半用于国内消费。因此,伊朗计划开发核能,而将节省下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用于出口,换取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外汇资金。伊朗认为,尽管伊朗石油资源丰富,但石油不能与先进、高效、低污染的核能相比。与伊朗同样拥有巨大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与俄罗斯也在开发、利用水电与核电。另外,近年来,伊朗大力提倡发展非石油产业,希望实现能源多元化和经济多元化。还有,作为历史文明古国,伊朗始终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大国意识,把核技术看作是国家实力和大国地位的

¹ Fareed Zakaria, “The Stealth Nuclear Threat”, *Newsweek*, August 16, 2004, p. 13.

^④ Douglas Jehl & Eric Schmitt, “Data Lacking on Iran’s Arms”, *U. S. Panel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5.

(四) 李学江:“美国锁定伊朗”,《人民日报》,2005 年 2 月 21 日。

^{1/4} “欧美联合对伊朗施压,哈塔米称伊朗不会放弃核计划”, http://chinadaily.com.cn/gb/doc/2005-02/25/content_419562.htm。

^{1/2} 张胜平:“伊朗议会通过法案,敦促政府继续发展核技术”,新华社德黑兰 2005 年 5 月 15 日电。

象征。正如伊朗总统哈塔米所说:“我们想变得强大,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技术,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先进的。”¹

其次,伊朗认为“敌人”已来到了家门口,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因而决心靠核技术这一有力武器来捍卫国家安全。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控制了伊朗左右两个近邻,对其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伊朗已成为美国下一个军事打击目标。美国还大力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推销美国版民主政治,矛头直指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严重威胁伊斯兰价值观。而以色列则与美国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动辄以空袭伊朗的核设施相威胁。在美国的战略挤压下,伊朗陷入生存危机和安全困境之中。为了抵御“敌人”的入侵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保卫国家安全,伊朗在积极备战、加强防御的同时,决定加快开发核技术,在国防领域取得“有效的核威慑力量”。同时,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伊朗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年 5 月 29 日,为回应和抗衡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朗总统哈塔米提出了规模更大的“大中东伊斯兰”倡议,旨在抵制美国对中东的民主改造,保障中东国家自身的民主、自由和价值观,推进中东地区的发展。^④

再者,伊朗欲利用核问题这张牌来构建自己的外交平台,打破美国的封锁,保护国家战略利益。伊斯兰革命后,由于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遏制和制裁政策,使伊朗在国际上备感孤立和被动,而核危机则为伊朗拓展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伊朗不断完善与英法德三国以及与俄罗斯的对话和合作机制,借以分化西方营垒,稳定国内政局,激发伊斯兰民族主义情绪,挑战美国的核霸权和双重核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伊朗核外交的最高目标是争取时间,跨过核门槛;最低目标是放弃核计划以换取有利于政治稳定、安全保证和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激励”。

而美国的核政策更加坚定了伊朗发展核技术的决心和意志。伊朗认为,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

取双重标准,对伊朗的核计划大做文章,紧盯不放,而对以色列的核武库却保持沉默,听之任之。这是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压而不服的重要原因。另外,“9·11”后,美国核政策的重大变化增强了伊朗发展核技术的紧迫感。2002 年 1 月 8 日,美国推出《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核武器可以使用”论。布什下令国防部制订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计划,把伊朗列入了 7 个潜在的核打击对象名单之中,^(四)这使伊朗承受了巨大压力,不安全感倍增。伊朗外长哈拉齐 2005 年 5 月 3 日在第七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发言时强调,美国庞大的核武库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一直反对签订禁止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近来甚至坚持将核武器用于实战和常规战争。他要求美国在法律上作出不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表示伊朗决心继续寻求包括铀浓缩在内的所有合法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¼

由于美伊长期互为仇敌,高度戒备,互不信任,因此很难就核问题坐下来直接谈判。作为主动、强势一方的美国也一直拒绝与伊朗直接对话,以免留下承认伊朗政权“合法性”之嫌。这样通过有影响的第三方——在伊朗有重大战略利益的美盟盟友欧盟的调停,政治解决核危机就成为美伊两国除战争之外的最佳选择。美国之所以没把战争作为首选,是因为它认为利益和威胁并存的伊朗是一块“实在不好啃的硬骨头”。美国如对伊动武,必将付出巨大代价,可能会面临诸如掀起伊斯兰世界和国内人民反战浪潮、与欧洲盟友翻脸、引发中东政治危机等许多严重后果。尽管美国不断发出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也反复发出随时准备消灭“侵略者”、随时启动铀浓缩计划的警告,但双方并未使敌对关系升级为战争,在政策选择上都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都留有回

¹ 陈兆华等:“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对伊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1 期,第 21 页。

^④ 张胜平:“伊朗总统提出‘大中东伊斯兰倡议’”,新华社德黑兰 5 月 30 日电。

^(四)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¼ 杨志望:“伊朗外长称伊决心继续寻求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新华社联合国 2005 年 5 月 3 日电。

旋余地,防止矛盾过度激化。同时,美伊两大宿敌一强一弱,实力不一,决定了两国外交政策的不同。

在核问题上,美国对“敌人”伊朗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双轨”推进,软硬兼施。“双轨”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特别是处理伊朗核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方面,美国态度一直十分强硬,极力主张国际原子能机构把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并谋求联合国施以制裁,从而孤立伊朗,并为军事打击提供合法依据。同时不断加强军事部署和经济封锁,对伊朗发动心理战和宣传战,推动伊朗内部的“民主运动”,以促使伊朗政权更迭,建立亲美的温和政府。另一方面,美国把国际原子能机构推到前台,试图通过核查把伊朗核计划扼杀在萌芽之中。同时,有保留地支持欧盟三国的外交斡旋,通过英德法三国向伊朗抛出经济诱饵,诱使其放弃核计划。布什在第二任期内可能会利用核问题,对伊朗打出外交施压、经济制裁、经济利诱、军事打击和内部促变等一整套“组合拳”,以期最终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彻底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但布什政府最希望的肯定还是利用核问题,对伊朗保持强大压力,以压促变,迫使伊朗走“利比亚道路”,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

作为被动、弱势一方的伊朗,在核问题上则对“强敌”美国采取了传统上的“以夷制夷”式的“第三国外交”战略,借用欧盟外力来消减美国的打压,与美国玩“老鼠斗猫”游戏。伊朗巧妙利用美欧、美俄之间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和利益冲突,积极响应欧盟三国的外交斡旋,充分发挥核合作伙伴俄罗斯的作用,这样既能发展与欧盟和俄罗斯全面合作关系,从中获得经济实惠,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又能增加外交回旋余地与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拓展生存空间,缓解与抗衡美国的孤立与遏制政策。在与欧盟三国的谈判中,伊朗常常审时度势,巧施缓兵之计,态度时软时硬,适时做些让步,以达成必要的妥协,尽量避免“闹僵”而将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处理,不给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甚至发动军事打击以任何借口。伊朗认为,尚未摆脱伊拉克困境

的美国不会轻易对伊朗动武,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和俄罗斯在核问题上与美国有重大分歧,也不会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美国本身亦难以单独对国力、军力远胜于伊拉克的伊朗发动另一场伊拉克式战争。另外,美国指责伊朗发展核武器缺乏证据,所以伊朗不甘示弱,敢与美国玩“猫鼠游戏”。两年多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外交行为特点可概括为:极力拉住、稳住欧盟,孤立美国,讨价还价,有妥协,有斗争,斗而不破。

三、美伊核争端的未来走向

建构主义是进化的、乐观的理论,对化解国际冲突是比较乐观的,这和新现实主义理论正好相反,新现实主义理论始终对国际冲突持悲观态度,认为冲突是无法调和、不可避免的。温特通过对新现实主义的大胆批评,借用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提出了极具影响的“认同转换论”。^①同时发展了国家互动过程的建构主义模式,认为决定认同和身份的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间并非永远相互为敌,军备竞赛和战争并非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建构主义把国家身份和利益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在互动性实践活动中既可以建构亦可以分解,国际关系的进程是朝着和解和非暴力的方向发展,国家在这个进程中可以创建新的国际体系文化。^②比如,在美国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美两国经过不断磨合和积极互动,从霍布斯文化(敌人文化)、洛克文化(对手文化)最终发展到康德文化(朋友文化),双方的角色认同实现了从敌人关系到对手关系、最后到朋友关系的转变。认同转换对美国近代和平崛起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仅是权力竞争,也有认同转换。^③而这一点对于处于与当年英国地位类似的美国以及与当年美国地位类似的伊朗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①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175页。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30页。

^③ 封永平:“国家互动与认同转换——美国和平崛起的建构主义分析”,《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第21-27页。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恢复邦交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国良性互动形成了新共识、新认同和新身份。建交前中美相互间的身份是“敌人”,尼克松上台后希望与中国建立“朋友关系”,多次向中国示好,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得到中国领导人积极友好的回应,中国决定化敌为友,联美抗苏,先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直至最后与美国建交。这说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互动能够促使身份和利益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国际关系。同样,错误的信号或者信号的误读往往会导致外交危机。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把中国看作是你的敌人,中国就会成为你的敌人。¹ 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把伊朗当作你的朋友,伊朗就会成为你的朋友。1997—2000 年期间,由于美伊调整观念,加强对话和沟通,两国关系曾一度转暖,形成良性互动,步入缓和期。1997 年 5 月,主张改革的温和派人物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克林顿总统对此立即表示欢迎。随后,哈塔米发出了著名的“文明对话”倡议,公开表示愿同美国人民进行建设性对话和文化交流。克林顿政府对伊朗发出的改善关系的信号迅速作出积极反应,呼吁与伊朗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地区问题进行政府间对话,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国内舆论也调整对伊态度,加强了与伊朗接触的呼声。作为回应,哈塔米通过“体育外交”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2000 年 3 月,在哈塔米刚刚再次当选伊朗总统后,美国宣布部分取消对伊朗的制裁。2003 年 12 月,伊朗发生强烈地震,4 万人遇难,美国随即展开“地震外交”,向伊朗派出了 25 年来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并向伊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美伊这两次外交试探中,虽然由于各自国内强硬派的阻挠,使两国良性互动未能深入、持久进行下去,但双方毕竟减少了敌意和对抗,增加了友善和了解,为两国政府的接触和两国关系的缓和打开了坚冰,从而也印证了“认同转换”、“文化是自我证实的预言”的建构主义逻辑。

因此,笔者对未来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还是持谨

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化解伊朗核危机还是有希望的。武力对抗和军事打击无助于伊朗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施压、斡旋和妥协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伊朗核问题发展的主旋律,政治解决核危机是美伊之间的最佳选择。为了推动欧盟与伊朗的谈判,布什政府 3 月 11 日作出了美国不再反对伊朗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允许伊朗购买民航飞机零配件的新决定,5 月 26 日,伊朗被世贸组织接纳为观察员,美国首次未表示反对,并投了赞成票。这表明布什政府对伊朗立场出现了一定的软化和松动迹象,给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增加了潜在的可能性。

伊朗驻华大使韦尔迪内贾德博士前不久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称,美伊之间既不是战争状态,也不是和平状态,而是处于互不信任状态。^④伊朗核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美伊的相互敌视政策。英国国会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怀疑伊朗建设核电站是为研制核武器做准备的说法“片面”,而且具有相当明显的政治目的。美国认为伊朗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没有建设核电站的必要。但是,如果当年亲美的巴列维政府不被伊斯兰革命推翻,那么到 1994 年,伊朗本该在美国的援助下建成 23 座核反应堆。^⑤

美伊核争端反映了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但如本文所述,两国互为敌人的认知和恶性互动因素也绝不能忽视。由于美伊交恶、相互隔绝 20 多年,双方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和起码的相互信任,仇恨和积怨甚深,加上宗教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两国消除隔阂、化敌为友绝非朝夕之事。但是,如果两国能够展开“文明对话”,打破“猜忌之墙”,^{1/4} 扩大共有知识和共有观念,加强文化认同,形成国家间良性互动,那么和平解决伊朗核危机,进而实现美伊关系正常化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责任编辑:黄丽梅)

¹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12 页。

^④ 王冲:“伊朗驻华大使:美国没有足够理由打伊朗”,《中国青年报》,2005 年 4 月 22 日。

^⑤ “加强透明度成伊朗核谜团的最关键问题”,<http://world.people.com.cn/G/1030/3215641.html>。

^{1/4} 伊朗总统哈塔米 1998 年 1 月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的谈话。参见 Philip Zelikow & Robert Zoelich, *America and Muslim Middle East: Memos to a President*, The Aspen Institute, 1998, p. 137.